我的大学记忆

序篇

我是广东佛山南海人，1994 年参加高考。当年考上的学校是广东机械学院。不过，我毕业证上的学校名称并不是广东机械学院，而是广东工业大学。原因是 1995 年，广东机械学院与广东工学院、华南建筑学院东院合并，组建成了广东工业大学。我当时就读的专业名称叫“机制工艺与设备”，属于机电工程系。说实话，这个专业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当年我最想读的是计算机应用或者电子技术专业，实在不行，会计专业也可以。但这些专业录取分数要求更高，以我的高考成绩达不到，所以最后只能调剂到了“机制工艺与设备”专业。这个专业当时有两个班，分别是机制一班和机制二班。我属于机制二班。不过平时两个班基本都是一起上课，所以实际上区别不大。

很多年以后，我经常看到一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这句话在很多场合被当成励志名言。但以我的经历来看，这句话是错误的。或者说，它只说对了一半。大一上学期，有一门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这门课不只是理论学习，还必须上机操作。那个年代，电脑还不是现在这样普及。我们使用的是 5.25 英寸软盘，容量 1.2MB，操作系统还是 DOS。现在大家都用 Windows，甚至很多高端用户使用 Mac。但在 1994 年的大学里，能够接触电脑本身已经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上机之前，所有同学都自费 10 元购买了一张软盘。

第一次上机实操，老师要求我们练习几个最基本的 DOS 命令：

- 格式化磁盘；
- 查看目录；
- 创建目录；
- 进入目录；
- 返回上级目录；
- 删除目录。

对应命令分别是：Format dir md cd cd.. rd，当时教材上的练习内容大概如下：

Format a:
a:
dir
md a
cd a
md b
dir
cd
b
dir
cd..
rd b
cd..
dir
cd..
rd a

dir

简单来说，就是先格式化磁盘，然后建立目录，再进入目录，删除目录，查看目录，通过这一系列操作熟悉 DOS 环境。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让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高中时期，我所在的学校曾经使用英文打字机训练学生打字。英文打字机的键盘布局和电脑键盘基本一样，只是没有数字小键盘。另外，我高中时期还接触过一些 BASIC 编程。我对计算机产生兴趣，就是从 BASIC 开始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键盘并不陌生。第一次上机时，老师布置的这些命令，我不到 5 分钟就全部完成了。可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学，却完全不一样。他来自粤北农村地区，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英文打字机，也没有用过电脑。甚至连键盘上的英文字母在哪里都不熟悉。一个简单的：Format a:，对他来说，都非常困难。他每次觉得自己输入完成，按下回车键以后，电脑都会提示错误。而他又看不懂 DOS 的错误提示，所以只能转过头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帮他检查以后，发现每一次错误原因都非常简单：

- 命令打错了；
- 少了空格；
- 漏了冒号；
- 忘记按 SHIFT 键，冒号打成了分号；

所以我每次回答他的都是："打错命令了。""漏空格了。""漏冒号了。""冒号要按 Shift。"但是直到 40 分钟的课堂结束，他依然没有成功输入一次正确的：Format a:。后来很多年，我都记得这件事情。我并不认为他笨。如果他真的笨，他也不可能和我一样考上大学。我和他的区别在哪里？不是智商，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成长环境不同。**我高中接触过英文打字机，接触过 BASIC 编程，所以进入大学以后，我只是把打字机键盘换成了电脑键盘。而他第一次面对电脑时，甚至需要先学习每一个英文字母在哪里。差距就出来了。所以后来再听到有人说："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我都会觉得这句话非常可笑。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努力当然重要，但是环境、家庭、教育资源、接触机会，同样重要。一个已经能在打字机上做简单的英文打字的人，和一个第一次看到键盘的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以后谁再拿"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来教育我，我大概率会用广州话回答他："叼你老母。"真正的强者，不是不承认环境影响，而是在看清环境以后，想办法突破环境。

老师篇

老太婆篇：

大一的时候，有一门计算机语言课程，学习的是 BASIC。这门课对我来说，基本等于重复高中时期学过的内容。高中时，我已经接触过 BASIC 编程，所以大学里的课程内容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严格来说，就算上课不认真听，我也有把握通过考试。当然，我并没有这么做。毕竟大学学习和高中不一样，既然开设了这门课，认真听讲、巩固以前学过的知识还是必要的。不过，在我看来非常简单的一门课程，最后考试的时候，却有人需要补考。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我清楚记得那次考试，试卷发下来以后，我不到半小时就全部做完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问题。这时候，一个现实的问题出现了：我想上厕所，而且不是那种"忍一忍还能坚持"的程度，是真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希望可以去一下厕所。监考老师是一位 60 多岁的女老师。我已经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因为当时我们一直都是称呼她"老师"。 为了方便叙述，后面就叫她"老太婆"吧。听到我要上厕所，老太婆直接拒绝。理由很简单：她担心我借上厕所的机会作弊。我解释说，如果不允许上厕所，那我可以交卷离开。老太婆想了一下，答应了。于是我把试卷交上

去，离开考场，直奔厕所。这是真的不是为了逃避考试，更不是为了作弊，纯粹就是——真的憋不住了。

我对老太婆这个老师的印象非常深刻。从大一到大三，我都还有她的课程，所以直到毕业，她一直存在于我的大学记忆里。大一的时候，老太婆负责的是物理实验课程，其中包括牛顿环实验和电阻测量实验。当时负责实验教学的老师一共有三位。第一位就是老太婆，另外两位，一位是中年女老师，另一位是一名个子比较高的男老师。因为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下面就分别称呼他们为“大个子”和“中年女”。 大个子负责力学和加速度方面的实验，中年女负责示波器等电子仪器相关实验。

大学实验考试采用的是抽签方式。考试当天，学生抽到哪个实验项目，就考哪个项目。而这三组实验项目，分别由三位老师负责监考。作为学生，我们当然会和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交流经验。上一届学生告诉我们：大个子的实验肯定能过。中年女的实验也不会故意卡人。唯一需要小心的是老太婆。甚至，他们还给老太婆起了一个外号：“灭绝师太”。这个外号来自金庸小说中的人物。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马上提高了警惕，毕竟谁也不想因为一个实验考试影响后面的学习。于是，我开始认真复习老太婆负责的那两个实验项目。特别是牛顿环实验，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不过复习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一个问题：老太婆负责的实验，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从实验原理和操作难度来看，比另外两个实验还简单一些。所以到了考试前，我心里其实已经有底了。

考试当天，同学们都在实验室外排队等待。轮到我之前，一位佛山地区的同学从实验室出来。他一脸郁闷地说：“抽到了牛顿环。”我心里当时想：怕什么？牛顿环又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实验。后来我知道，这位同学的实验考试顺利通过了。过了一会儿，另一位潮汕籍的同学也出来了，他抽到的是电阻测量实验。但是出来的时候，他满脸愤怒。我迎上去问：“怎么了？”他气冲冲地回答：“他妈的，那个电压表是坏的！”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基本判断：这位同学大概率要补考了。而事实也证明，他和老太婆之间的“恩怨”，后来一直持续到了毕业。不过最后，他释怀了。原因后面会说。

终于轮到我进入实验室。我抽到了和这位潮汕籍同学一样的实验。我先报上姓名，然后开始做实验。流程很简单：先进行实验前计算，然后按照要求进行接线。接线过程中，我发现电压表有一个触点不是特别灵敏，不过仔细操作的话，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完成接线。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旁边的中年女老师问老太婆：“刚才那个学生怎么回事？”老太婆回答：“他说电压表坏了，你看，不是好好的吗？”听到这里，我心里暗想：完了，刚才那个同学估计真的要挂。

我的实验进行得比较顺利，记录完数据以后，我以为基本结束了。但是老太婆并没有马上让我离开，而是在旁边开始挑问题。她指着电阻箱问我：“你为什么要接最大的电阻？接 9 欧不行吗？”（电阻箱阻值范围是 9 欧到 99 欧。）我看了一眼实验前的计算结果，然后回答：“我的计算结果是 10.5 欧。按照要求，电阻必须大于 10.5 欧才可以。”老太婆听完以后，没有再说什么。最后，这门实验考试我取得了比较高的分数。

在实验过程中我观察另外两位老师负责的实验考试。大个子老师在学生做实验时，基本不会仔细检查。学生完成实验，结果没有明显问题，他就直接给及格。中年女老师稍微严格一点。她会盯着学生操作。特别是使用示波器这类价格比较高的仪器时，她会特别注意，不时提醒学生这里不能接，那里不能碰。但是她主要是为了保护仪器，而不是故意卡学生。只要实验完成，也是给学生通过。这两位老师的大概率是认为：实验课的目的，是训练学生掌握基本操作。这些实验，学生毕业以后未必还会直接碰到。没有必要因为一些小问题，让学生补考，而且补考也意味着他们自己还要重新监考一次。

我们学生害怕补考，并不是单纯怕麻烦。因为学校当时有一项规定：四年大学期间，

如果累计超过三门课程补考，毕业时不发学位证。如果达到三门补考，毕业设计必须取得“优秀”，否则同样无法获得学位证。至于其他学校有没有类似规定，我并不清楚。前面提到的那位潮汕同学，后来确实又有两门其他课程需要补考。这样一来，他正好达到了三门补考。所以，他在大学期间一直对老太婆当年让他补考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的毕业设计恰好由老太婆指导，结果他的毕业设计拿到了“优秀”。 最终，他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多年以后，当我们再次聊起老太婆的时候，他说他在拿到毕业设计优秀的那一刻释怀了。

大二的时候，老太婆又教了我们一门课——《金属切削刀具》。大三的时候，她继续教我们《专业英语》。这两门课最后所有同学都顺利通过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大二那年的《金属切削刀具》课程设计。做金属切削刀具课程设计时，有一个项目需要通过绘图测量得出最终数据结果。当时要求比较严格，绘图过程中的作图痕迹必须保留，不能只留下最后结果。完成设计以后，学生两人一组进去和老太婆答辩。轮到我和同组同学进去的时候，老太婆拿起直尺，开始测量我们的结果。她测量后说道：“你们两个做的怎么误差这么大？结果相差了两毫米。”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其实有点不以为然。当时的想法是以后工作都是用电脑 CAD 绘图，尺寸可以做到非常精确。现在手工作图，只要掌握方法，知道计算过程，结果基本正确就可以了。盯着这两毫米的误差，有必要吗？接下来，老太婆又开始检查我们的作图过程。她指着我的图问：“你这条中垂线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回答：“用圆规以弦的两个端点为圆心，画两个相交弧，然后连接交点与弦所在圆的圆心，这样得到中垂线。”老太婆马上说：“不对。你应该画四个弧，得到两个相交点，再连接这两个交点，才是正确的中垂线。”然后她又补了一句：“怪不得你们两个的结果差那么多。”听到这里，我当时一股火直接顶到了胸口。我忍不住反问：“数学里面有定理，圆上的弦的中垂线必过圆心。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这样不是更直接、更准确吗？”这一下，老太婆沉默了。最后，这个课程设计我还是通过了。不过分数并不高，对此我也没有太在意。多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件事，我也会问自己：当时这样顶撞老太婆，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不反驳，会不会因为她认为我的方法“不规范”而让我不及格？反驳以后，会不会因此得罪她？不过现在想想，我认为得罪她可能性不大，老太婆虽然刻板，但应该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她教过那么多届学生，遇到比我更冲的学生肯定也不少。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讲给宿舍同学听。结果宿舍里阳江籍的同学，居然认为老太婆说得对，认为我的画法不正确。这让我有点意外。但是另一位来自湛江的同学站出来支持我的观点。这个小插曲反而让我意识到：知识这种东西，如果长期不用，真的会慢慢遗忘。即使当年学过数学定理，如果多年不接触，也未必还能马上想起来。

现在再说说《金属切削刀具》的课程设计。我们当时设计的是一种用于加工内孔的刀具——拉刀。课程设计一共有两道题。第一题：被加工材料是工具钢。第二题：被加工材料是 45 号钢。当时学生分成两组，分别由两位老师指导。一半学生由老太婆负责，另一半学生由一位教授《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的 60 岁左右男老师负责。这位男老师后面还会有故事，为了方便叙述，暂且称他为“测量老头”。 我当时分到了老太婆这一组。老太婆把她负责的学生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做第一题，另一部分做第二题。我被分到第一组，也就是设计拉工具钢的拉刀。拿到题目以后，我们没有多想，直接按照设计实例套公式计算。但是计算到最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设计出来的刀具强度要求和实际情况完全对不上。按照计算结果，这把拉刀根本做不出来。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计算错误，于是我和同组同学互相检查，结果发现，大家算出来的结果基本一致。后来我们重新研究题目，发现了一个疑点，工具钢的强度比 45 号钢高很多，拉削时需要的力量自然更大。但是题目给出的条件却是：第一题拉工具钢，但是孔径很小。第二题拉 45 号钢，但是孔径反而更大。这就非常不合理。经过讨论，我们怀疑：是不是题目把两道题的加工孔尺寸搞反

了？正常情况应该是：工具钢对应较大的孔；45 号钢对应较小的孔。于是当天下午，我们拿着计算结果去找老太婆。老太婆拿过我们的计算过程检查，看完以后，她没有说题目错，她说：“你们的刀具材料不要选普通高速钢，要选择更好的材料。润滑液也要选择最好的。安全系数不要选最大值，可以降低一些。”我们按照她的要求重新计算，刀具材料升级，用最好的润滑油，最后甚至把安全系数选到了允许范围内的最低值，这样才勉强满足设计要求。之后继续完成绘图设计，最终，这个课程设计所有人都顺利通过。多年以后，进入工作岗位，再回头看这个设计，如果这个设计发生在真正的工厂里，负责设计的工程师估计会被老板骂。原因很简单，第一，刀具材料升级意味着成本增加。第二，使用最好的润滑液，同样会增加生产成本。第三，安全系数选得过小，会导致刀具寿命降低。刀具容易磨损，甚至断裂。最后增加的是生产停机时间和维护成本。在学校设计中，只要满足计算要求、能够完成课程设计即可。但是在工厂里，一个好的设计不仅要考虑“能不能做出来”，还要考虑：成本，寿命，稳定性和可维护性。

说完老太婆这一组，再来说说测量老头负责的那一组。和老太婆不同，测量老头并没有强制学生分组，而是让大家自己选择做第一题还是第二题。按照普通人的思维，很多人都会下意识选择第一题，毕竟第一题排在前面，而且通常大家会认为第一题应该是比较常规、比较容易的。但是这一次，情况却有点出乎意料，那一组的学生，居然大部分都选择了第二题。量老头问了一位来湛江籍的同学：“以前的学生都是选第一题的比较多，你为什么不选第一题？”这位同学回答：“第二题的刀具比较粗，手工画图的时候比较容易画。”然后测量老头还一直忽悠其它同学选第一题。同学回宿舍后跟我们说这事，我听完以后，马上提醒他们：“不要选第一题。计算第一步就可能卡死。”然后我把我们老太婆那组遇到的问题告诉了他们。其中一个和我一样来自佛山南海的同学听完以后，直接评价：这个测量老头纯粹是“靠害”。“靠害”是广州话里的俚语，意思就是故意坑别人、害别人。

测量老头和笑面男篇

说到测量老头，那就再聊聊他教授的课程。他负责的是《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这门课程其实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机械基础课。它的核心内容，并不是复杂的数学推导，而是机械行业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测量老头上课时，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所以说，基本的东西你们要搞懂。”问题是，他说了很多次“基本的东西”，却没有真正告诉我们：这些基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的授课方式，基本就是按照教材内容重新讲一遍。课本写什么，他就讲什么。但是课本上的概念和实际工程之间，缺少了一座桥。直到大学毕业，我其实都没有真正理解：间隙配合、过渡配合、过盈配合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当时我还错误地理解：过盈配合，就是把大一点的零件硬用锤子敲进去。但是当时作为学生，如果老师没有把背后的逻辑讲出来，也不能完全怪学生。直到参加工作以后，我才慢慢从实际生产中理解了互换性的真正含义。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测量老头在第一节课就这样解释：“在理想状态下，设定所有的材料都是刚性不变形的，一丝不差同样大小的孔和轴是不可装配的，轴必须比孔小一点。到底小多少，就是我们这门课程所教授的内容“。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马上理解这门课程为什么存在。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这样讲。所以大学四年，我一直只是记住了一些概念，但是不知道这些概念背后的工程意义。甚至因为这个问题，我还被模具师傅笑话过很多次。他们听到我的理解以后，经常调侃：“还大学生呢？轴要比孔小一点才能装进去，这个都不知道？“很多工程知识，如果只讲定义，不讲为什么，学生很容易变成考试会做题，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拿来干什么。

说完测量老头，接下来再说一个和他气质有些相似的老师。这个老师平时脸上总带着

一种轻蔑的笑容。他教的是《金属切削工艺》，我这里就称他为“笑面男”。 据我所知，笑面男在当大学老师之前，曾经在工厂里当过工程师或者技术员。按理说，有工厂经验的老师应该是很受学生欢迎的。因为书本上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亲自经历过的实际问题。可惜，笑面男并不是这样。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车床车外圆。他说，如果一根棒料本身不是标准的圆柱形，而是椭圆形或者其他不规则形状，那么车出来的外圆，也会带有原来棒料形状的某些特征。然后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想出来，为什么？”当时我们确实全懵逼了，没人回答得出来。这时候，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熟悉的轻蔑笑容，然后说：“我以前带过一个会计班的学生做金工实习（那个时代广东机械学院的学生除了外贸专业，其它的都要进行金工实习）。他们都能想出来，你们这些学机械的，反而想不出来，真是难以理解。”其实我们当时想不出来，是潜意识里，机床是刚性不变的。在这个潜意识限定里，当然是想不出来了。那位会计系的学生能想出，那是他当时跳出了这个潜意识设定。那个车削留下前面形状的现象其实就是机床不是纯刚性会变形造成的。没有经过工厂实习的学生，在这种潜意识的限定下，想不出来也是正常的。这个笑面男把自己在工厂的经验当做武器向没经历过的学生实行降维打击，用“只有我懂，你们不懂”的心态在我们面前刷优越感 ，其实是非常可恶的。这其实不是教学，这是刷优越感。同宿舍云浮籍的同学私下跟我吐糟笑面男是为了为难学生的目的来上课的。反正我也是很讨厌上他的课。

后来回想大学里的这些课程，我越来越觉得，好的教学，本质上就是帮助学生“偷懒”。 这里的“偷懒”，不是不努力，而是让学生不用再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牛顿总结出三大运动定律，就是为了让后人不用再花几百年的时间，从零开始探索物体运动的规律。我们今天学习牛顿三大定律，可能三节课、120 分钟就能掌握基本内容。难道是因为我们比牛顿聪明？当然不是。而是因为牛顿已经把最关键的规律提炼出来，把复杂的问题总结成了简单清晰的理论，我们只是站在他的肩膀上学习。《互换性与技术测量》《金属切削工艺》这些课程里的很多内容，并不是某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出来的。公差、配合、基准、测量误差、加工变形……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无数工程师、工厂工人，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经验，其中很多甚至是花费大量时间、金钱，甚至付出失败代价换来的“血泪经验”。 那么大学老师的作用是什么？不是简单把教材内容念一遍。而是应该把这些前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积累的经验，提炼出来，用学生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传递下去，让学生用几个月的学习，跳过前人几十年的摸索。这才是教育最大的价值。可是有些老师他们掌握了这些经验，却没有真正传递给学生。他们念教材，然后不断抛出一些需要有经验才能理解的问题，让学生自己猜。这就像把牛顿定律藏起来，然后对学生说：“基本的东西你们要自己悟。”学校应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思维框架，让他们进入工作以后能快速理解，而不是让学生毕业以后才发现：大学里学过的东西，只记住了名词，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然后进入工厂，再重新花几年时间，从实践中补回来。很多人在工作中领悟到的知识和经验都不会跟别人分享，我想这是跟这种大学的学习环境逼出来的。这些知识之前的老师也会啊，他们都没直接传授给我，我自己领悟出来，凭什么白教？这种思维也是大学老师造成的。这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技术落后于西方了。

社建女和马列男篇

前面说到的几位老师，已经让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不过，大学里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说前面几位老师的问题，更多体现在教学方式和工程理念上的差异，那么接下来要说的两位老师，则是另外一种类型。大学四年，遇到的老师很多。有认真负责的，让

我至今难忘的。当然，也有一些老师，会因为自己的言行给学生留另一种印象。下面要说的，就是大二教授《社会主义建设》的女老师，以及大三教授《马列主义教程》的男老师。为了方便叙述，后面分别称他们为“社建女”和“马列男”吧。

先说社建女。在讲她之前，先介绍一下当年学校的一项规定。每个学期期末，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对任课老师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评价并不是让学生随便打分，而是有一套具体标准。比如：老师有没有布置作业；课堂纪律管理情况；是否按照教学要求完成课程；等等。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项目后面选择“是”或者“否”。然后根据这些“是“和”否“的多少一级级地套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整个大学期间，我们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给老师评价。大一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到了大二，社建女这里却出了问题。那学期最后一节课，她在课堂上突然对我们说：“这次给我评分，你们两个班，一个班给我评良，另一个班给我评中。我以前一直都是优。我觉得我以前太纵容你们了。所以，我决定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对你们严格要求。”以上是当年她的原话，我一个字也没加，一个字也没减。当时我们两个班按照学校规定进行评价。我们班最后给她评了“中”， 结果期末考试结束以后，我们班有 9 个人需要补考。而我，正好是其中一个。一班给她评的是“良”， 有 5 个人补考。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班有一位同学，补考以后仍然没有通过。到了第二学期开课的时候，社建女在课堂上说道：“你们补考还有人不及格。没办法，不及格就是不及格。”读过大学的人应该知道，这类课程的考试有一个特点：主观题，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标准答案。回答可以说正确，也可以说不够完整。至于最后给多少分，很大程度取决于阅卷老师的判断，学生即使觉得评分有问题，也很难真正改变结果，因为试卷掌握在老师手里。后来，有同学把这件事反映到了辅导员那里。但是辅导员也很无奈，只能说：“没办法，谁叫你们碰到这样的人？”其实现在回头看，如果社建女真的非常希望获得“优秀”评价，她完全可以提前告诉我们。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们当时做的，也只是按照学校规定进行评价，并没有故意降低她的评分。如果问我当时恨不恨社建女？说实话：恨。而且当时是非常强烈的恨。虽然最后这件事并没有导致我拿不到学位证，但那种被老师利用考试成绩来回应学生评价的感觉，确实让人非常不舒服。不过时间确实是最好的缓冲。几十年过去，现在再回想这件事，我已经没有当年的愤怒了。只能说：这也是大学经历中的一个插曲，一个曾经让我非常难受，但最终也随着时间慢慢淡去的故事。

因为《社会主义建设》这门课补考的事情，我临近毕业的时候，还被同学拿这个梗小小地恶心了一把。那是快毕业的一天，我和宿舍几个同学聊起大学四年的生活。大家感慨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差不多都是：大学四年，好像也没学到多少真正能马上拿来用的东西。这时候，同宿舍阳江籍的同学不同意我们的说法。他说：“不能这么说。我们毕竟是大学毕业生，肯定有一些比普通人更敏锐的感知和洞察能力。以后做事情，也会比普通人做得更好。而且在工作中，你会不知不觉把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应用出来。”但这么说太抽象了，与没说差不多。于是我反问他：“那你说说，这四年你到底学到了什么？以后你能做什么工作？”这两个问题放在快毕业那个时间点，其实还真不好回答。你总不能说：“我学会了机械原理，所以毕业以后去设计机器。”大学里的课程很多，但真正能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马上拿出去独立干活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阳江籍同学显然也被我问住了，但是他没补考过《社会主义建设》，他突然灵机一动，对我说：“我学会了社会主义建设，能建设社会主义。”说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我还能怎么办？只能尴尬地跟着笑。毕竟，这门课我可是补考过的，他没有补考，这个梗，他确实有资格拿来恶心我一下。

相比之下，马列男就比社建女好得多。当然，我也不认为他是什么好人。但在我看来，他至少算是个**真小人**。马列男是在我们大三的时候教《马列主义教程》。这门课一学期

就学完。到了最后一节课，他直接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很难。认真上课、认真做笔记的，不一定及格；不认真上课、没做笔记的，肯定不合格。你们谁要是担心不及格，提前跟我说一声。”以上是他当年的原话，我也是一字没加，一字没减。这话说得已经够明白了，我们一听，马上就懂了。送礼的时候，一般是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一起去，以宿舍为单位。马列男收礼的时候，也不忘继续演戏，他一边收礼，一边拿出课本，煞有介事地给我们划重点，然后又问我们的学号，在名单上一个一个打勾。后来有同学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同宿舍的人，名单上的勾选记号似乎不一样。等到成绩出来以后，大家又发现，不同记号对应的成绩段也不一样。不过最终结果很简单，全员合格。在考试前，马列男还专门在班上强调过一句话：“所有的问答题，不论你们懂不懂，都要回答！”现在回头看，这句话其实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列主义教程》这类课程，主观题到底能拿多少分，老师拥有非常大的裁量空间。你答得对，可以给你满分，也可以认为你回答不完美，给你低分。至于到底给多少，很大程度上就是老师说了算。所以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自然就明白了其中的门道。当然，这种事情基本只发生在这些文科性质比较强的课程里，我们理工科的老师，基本不会收礼。至少我在整个大学期间，几乎没有见过哪个理工科老师因为考试收学生的礼物。据说最狠的一次，有学生送礼，老师直接把礼物从楼上扔到了楼下。这不是我亲眼见到的，我不敢保证真假，但这个故事在学生之间一直流传。而我们机制班整个大学四年，真正因为考试去送礼的，我印象里就马列男这一次，其它课程，据我所知，没有了。我对马列男的评价反而有点复杂。他的人品当然谈不上好，但至少他把规则摆到了桌面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至少是一个**明码标价的真小人**。而社建女恰恰相反，她因为学生没有给她评“优”，就在考试上卡人，而且还直接说出来我就是要卡你，把所有人都恶心到了。事先却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清楚。所以在我看来，马列男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至少比社建女强得多。真小人让你讨厌，但不会让你猜。

数据老头篇

上大学期间，因为我一直对计算机感兴趣，所以报了学校的计算机辅修班。当时也有同学报了会计辅修班。按照老师的介绍，只要把辅修专业的课程全部通过，学校就会发一个辅修毕业证。这个证书相当于这个专业的大专学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我本来就对计算机感兴趣，而且高中时已经接触过 BASIC。我也相信，只要认真学，计算机这方面我应该不会学得太差。事实也证明，我后来的计算机辅修课程成绩确实不错。不过，这里面偏偏出了一个例外，就是《数据库原理》。教我们《数据库原理》的，是一位 60 多岁的男老师，为了方便叙述，我就称他为“数据老头”。 数据老头也是我大学期间遇到的比较混账的老师之一，前面的测量老头上课，至少还会照着课本念，数据老头更干脆，连课本都懒得念。上课以后，他基本就是让我们自己看书。还称不好教，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说测量老头属于“照着教材念，没把东西讲明白”，那么数据老头就属于“我也懒得讲，你们自己看”。 这种教学方式，我实在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到了期末考试，我最后只考了 63 分。63 分当然及格了，但这个成绩反而让我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愤怒。因为计算机辅修班的其他课程，我的成绩都相当不错。除了《数据库原理》的 63 分以外，其他课程最低的也有 86 分，就是那门叫《数值分析》的。我记得更高分的是《编译原理》，96 分。《操作系统》我是拿了满分。《Pascal 语言》和《汇编语言》好象一门 87，一门 89。除了《数据库原理》我的所有其它计算机辅修课程没有一科是少于 80 分的。所以 63 分在我的成绩单上显得特别刺眼。回头再看，《数据库原理》甚至比《操作系统》和《计算

机网络》这些要简单得多。我认为如果老师认真教，我完全可以把这门课学好，问题是，老师基本没教，最后却让学生自己承担学习效果的后果。我觉得这种大学老师是真的在误人子弟。更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是，和我一起参加计算机辅修的潮汕籍同学，这门《数据库原理》直接没有及格，而辅修毕业证是要把全部课程通过才能拿到的。他因为这一门课不及格，直接失去了辅修毕业证。很多年以后回头看，这张辅修毕业证对他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站在当时那个学生的角度，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辛辛苦苦读了一整个辅修专业，最后因为其中一门课没有通过，拿不到学校承诺的那张证书，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当时的愤怒。我自己虽然侥幸考了 63 分，拿到了及格，但想到这门课本来可以学得更好，却因为老师根本没认真教，最后只能拿到这么一个成绩，我当时同样非常窝火。

赵老师与李老师篇

人有好人，也有坏人。老师当然也是一样。如果大学里所有老师都像前面说的那几位，那大学确实也没什么好读的了。当然，老太婆不算在里面。她虽然为人刻板，有时候也让我很窝火，但回头看，她的本性并不坏。至少她没有像社建女那样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报复学生，也没有像马列男那样收礼。大学四年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正面影响的老师其实也不少。但如果要挑最突出的两位，我会选带我们去河南洛阳实习的赵老师和李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河南人。李老师是当时机电工程系的系主任，名字叫李景翔。

去河南洛阳实习，是我大学期间一次很重要的经历。在赵老师的带领和讲解下，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机械加工和工艺知识。虽然这些东西后来对我的具体工作帮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但它至少让我看到了课本之外的机械世界，开阔了我的眼界。实习结束的时候还有实习笔试考核，我的实习成绩拿了“优”。 赵老师后来还带了我的毕业设计。我当时的毕业设计题目，是 **AutoCAD 二次开发**。那时候使用的是 AutoCAD R12，我用 AutoLISP 语言写了一个画凸轮的程序插件，扩展 AutoCAD 的功能。只要输入相应的参数，程序就可以自动生成凸轮的外形。现在回头看，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甚至有点像在“折腾”。那个 Lisp 语言不象其它，它用的是前缀式，后面的括号多得数不完，多一个或少一个都出错。而且，当时也没有很好的 Debut 程序，我是一行行代码人工检查出来的。写程序半小时，检查 Debug 要半天或以上。在当时，AutoCAD 二次开发本身就属于比较新鲜的东西，而我又确实对计算机感兴趣，所以做这个课题的时候还是挺投入的。不过，我们是机电工程系的学生，毕业设计除了自己的专业课题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手工机械制图工作量。于是我又画了一套机床滑台。这个东西基本就是照着资料抄，谈不上什么设计。最后答辩的时候，一共有三位老师，其中一位就是赵老师。因为我是机电工程系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一直抓着我那套机床滑台提问题。问题是，那套滑台本来就是我照着资料画的，我对它的设计原理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所以老师一问，我自然很多都答不上来，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只能解释“我的毕业设计题目是 AutoCAD 二次开发，机床滑台只是为了满足机电系的制图要求附带画的。” 这句话其实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最后，我的毕业设计成绩只拿到了“中”。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学生毕业设计只拿“中”，指导老师大概也不会太高兴，但赵老师给我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不但没有因为我的成绩不高而批评我，反而专门鼓励我，虽然最后成绩只是“中”，但他对我的毕业设计很满意。这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很重要，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一个毕业设计拿了“中”，多少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赵老师的话，让我知道，成绩是成绩，老师对你的能力和努力的评价，又是另外一回事，这

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当然，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也得承认，当年那个 AutoCAD 插件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现在看来，甚至可以说有点“胡闹设计”的味道。输入几个参数，自动画出一个凸轮外形，听起来挺像回事，但实际使用价值并不高。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我真的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计算机知识，和机械专业结合起来做点东西。而赵老师对我的肯定，也让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对自己的能力多了一份信心，这大概就是一个好老师真正能给学生留下的东西。不一定是一条公式，也不一定是一项技术，有时候，仅仅是一句：“我对你的作品很满意。”就足以让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多一点相信自己的勇气。

至于李景翔老师，我想说：我一生都要感谢他。他值得我记住，如果没有他，我当年很可能拿不到大学毕业证。而这件事情，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有多大，不用多说。所以我一直希望，愿所有看过这本回忆录的人，都能在人生中遇到属于自己的“李老师”。

不过，在讲李老师之前，必须先把当年学校以及我们专业的一些情况交代清楚。我们大学当时正处于教学改革阶段，开始实行学分制，除了本专业的课程之外，学生还必须选修其他非机械专业类别的课程，凑够相应的学分。这几类分别是工程类、经济类、人文类。例如选修单片机原理，高级电工学这些课程，属于工程类；选修市场营销，证券投资这些，属于经济类。选修英文打字，五笔打字，文件检索这些，属于人文类。其中：工程类需要 6 学分；经济类需要 4 学分；人文类需要 4 学分。任何一类少一分都不可以毕业。当然，超了可以。问题是，这个规定学校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告诉我们。直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对于普通同学来说，问题还不算太大，他们没有参加辅修，平时有时间大量选修其它课程，基本上都已经把学分修够了。但我们几个参加计算机辅修的学生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时间本来就已经被计算机辅修课程占掉了，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再去选修其他课程。直到距离毕业只剩下两个月的时候，学校突然公布了这个要求，我赶紧检查自己的选修学分，工程类倒是够了。而且即使按照当时的规定还差一点，计算机辅修的课程也可以拿来抵工程类学分。但是经济类和人文类就麻烦了，我人文类只修了一门《英文打字》，1 学分（虽然我高中学过英文打字，但不熟练。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又报了选修英文打字）。经济类只修了一门《证券投资》，也是 1 学分。而学校要求这两类分别达到 4 学分。也就是说，我还差得非常多，按照当时的规定，我必须在剩下的两个月里，再选修这两类课程，并且通过考试。算下来，需要再修四门课，每门 1.5 学分，两个月，四门课，还得全部通过考试。这是什么难度？我当时觉得，这基本就是地狱模式。但有什么办法？毕业证就在前面吊着，只能硬着头皮去报名。

就在报名的时候，我碰到了李景翔老师。李老师当时是机电工程系主任，并不直接给我们上课，但他和赵老师一起带过我们去河南洛阳实习，所以对我印象很深。他一看到我，就直接问：“你来干什么？”我就把学校突然要求补足选修学分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最后我还跟他说：“工程类学分我是够的。其实我计算机辅修的学分很多，如果这些学分能够拿来抵人文类和经济类的话，我不但能全部抵掉，最后还会多出十几个学分。”李老师听完，马上对我说：“你跟我到校务处。”没有让我自己去问，也没有说什么“这是学校规定，我也没办法”， 他直接带着我去了校务处。

到了校务处，他找到负责毕业资格审核的老师，然后直接替我说话：“这个学生学习不错，计算机还参加了辅修，也已经修完了。现在就因为这个学分的问题不能毕业，太可惜了。而且这对学生也不公平。我看这样吧，用他辅修的学分，把人文类和经济类的学分抵掉。”李老师当时是系主任，又是共产党员，在学校里说话自然有分量。校务处最后同意了这个办法。于是，我原本需要在最后两个月里疯狂补四门课、并且还要全部通过考试才能拿到的毕业证，就这么解决了。而且不只是我，我一起参加计算机辅修的几个同学，也一起沾了光。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不简单，李老师虽然只是帮我们协调了一下学分认定。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这根本不是“小事”， 那是一张毕业证。没有毕业证，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会怎么样，我根本不敢想。而李老师当时完全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对我说：“这是学校的规定，你自己想办法补学分吧。”这样做谁都不能说他错，毕竟那确实是学校的规定。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听完我的情况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你跟我到校务处。”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在我的大学回忆里，李景翔老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前面那些老师，有的让我生气，有的让我失望，有的让我觉得可笑，也有赵老师这样给过我鼓励的人。但李老师不一样，他在我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实实在在地帮了我一次。而且不是口头上的鼓励，也不是一句“好好努力”， 他直接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替一个学生解决了一个可能影响一生的问题。我一生都要感谢他。我也真心希望，读到这里的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能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愿意站出来，对你说一句：“你跟我来。”这就够了。

学生篇

作弊

讲到大学，就离不开大学生，有学生，就会有围绕考试、成绩、作弊等各种各样的故事。所以，学生篇我就从作弊开始写。1994 年，我刚进入大学一年级，那一年，对于考试作弊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专科学生作弊会怎么处理，我不是很清楚。但本科生如果作弊，后果非常严重，轻则取消学位，严重的甚至连毕业证都没有，只能拿到肄业证。在这样的规定下，依然有学生不信邪，选择顶风作案。当时，机制一班有一个原籍湖南的学生，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说明“原籍湖南”？ 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当年的高考政策，那个年代，中国大陆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高考移民。一些地区因为高考竞争压力不同，会有人通过迁移户籍等方式改变报考条件，这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背景。说回这个作弊事件，这个机制一班的学生，平时逃课比较多，期末考试临近时，他为了通过考试，竟然跑到教务处，偷了一份大学物理期末试卷。但是问题来了：试卷虽然拿到了，他自己却不会做。于是，他把试卷交给了同班一个关系比较好的英德籍同学。结果很尴尬，英德籍同学同样不会做。因为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风险越大，所以他们也不敢直接在机制班内部传播，他们试卷转到了材料系一名学生手里。巧的是，材料系这个学生也不会做。于是，试卷经由材料系的学生继续流转，最后到了我们机制二班一名湛江籍同学手里。这位湛江同学不一样，他会做。于是，他把试卷上的所有题目，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道一道演算出来。当时大学考试前，老师允许学生在教室里复习，考试开始前，大家都在看自己的教材、笔记，准备最后冲刺。考试正式开始以后，监考老师要求：所有教材、笔记本全部交到讲台，桌面上只能留下计算器和草稿纸。大家也都按照要求做了。

考试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监考老师可能觉得无聊，就开始随手翻看学生交上来的课堂笔记。结果翻着翻着，终于翻到了那本写满考试题答案的笔记本。老师拿着笔记本问：“这个笔记本是谁的？”那位湛江同学只能站起来承认。老师让他离开了考场。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调查，事情一层层被查出来。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最开始偷试卷和传试卷的几个人，被记大过。而那位湛江籍同学，因为实际参与情况不同，被要求重新考试，没有受到处分。四年以后，我和这位湛江同学一起做毕业设计。有一次聊天时，我们又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说，当时他跟老师解释：他不知道那份试卷是偷出来的。如果知道的话，肯定不会把写有答案的笔记本带进考场。另外，他和系里的辅导员关系不错，辅导员也帮他说了几句话，辅导员认为：如果他真的知道这是偷来的试卷，正常情况下不会冒这么大的风

险，把笔记本带进考场，所以最后学校才做出了这样的处理。说实话，当时听完他的解释，我心里是不太相信的。毕竟一份偷出来的期末试卷，怎么可能经过几个人转手，最后还能不知道来源？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直接拆穿他，一方面，事情已经过去了，另一方面，我们关系还不错，把话挑明，对谁都没有好处，也只会影响彼此关系。所以，我当时只是听完，然后没有继续追问。

这件事情其实很有那个年代大学的特点。学生之间的信息流动、人情关系、辅导员的作用，都在很多事情处理中发挥影响。而这一次考试作弊事件，也折射出了当年大学校园里的一些真实生态。

还是上面那位原籍湖南的同学，到了大三，他又因为作弊惹出了事情。那次是法律考试。考试的时候，他拿出纸条作弊，结果被授课老师兼监考老师当场抓住。估计那位法律老师的想法，跟前面我说过的“大个子”老师差不多：不太想把学生往死里整，所以最后，老师给了他 60 分，刚好及格，不用补考。两个班的学生里，也就他一个人是 60 分。事情本来到这里也就算了。这件事情后来传到了机械系的模具专业，我们是机电系，模具班属于机械系。当时模具班有几个人法律考试没有通过，需要补考，于是，这几个人——也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两个——跑去找校领导，匿名举报了这位原籍湖南的学生作弊。这一下，事情就变了，老师原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既然已经有人正式举报，而且还是向校领导举报，老师也就没有办法再偏袒他了。于是，他最终还是被要求补考，至于有没有受到其他处分，我后来没有仔细打听。估计还要记过吧。件事情后来我还跟机制一班的一位广州籍同学聊过，他说：“如果被举报的是我，我把那个举报的捅了。”我当时听了一激灵，我说：“问题是又不知道到底是谁举报的，你怎么捅？”他回答得非常干脆：“全捅了。”我当时心里马上冒出一个念头：幸亏当时被举报的不是你。当然，他当时也就是这么说说，真要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到底会不会真的去做，是另外一回事。人正常情况下还是理性的，真正遇到这种事情，未必真会冲动到那个程度。

不过，多年以后再回头想这件事，我的看法反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当时真的有人因为这件事情挨了刀，我甚至觉得：从道理上说，也只能怪他们自己。当然，暴力解决问题肯定是不对的。但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机制班和模具班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不是一个系，平时也几乎没有交集。你因为自己考试不及格，去举报一个与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作弊，如果举报以后，你们自己因此获得了什么实际利益，比如学校因此免除了你们的补考，那还可以理解。至少你可以说：“我举报他，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了我的利益。”但问题是：他们举报完以后，自己该补考还是得补考，什么好处都没有。只是把原本已经被老师放过的那个人，也拖进了补考，这就纯粹是损人不利己。所以现在回头分析，我觉得他们当时的心理可能就是一句很朴素的话：“我倒霉了，最好有更多人陪我一起倒霉。”这种心态在学生时代其实并不少见。自己没考过，看到别人作弊却通过了，心里不平衡，于是举报。最终的结果是：自己还是要补考，别人也被拉下来一起补考。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甚至比那次考试作弊本身更能体现学生时代的一些人性。

至于后来为什么这位原籍湖南的同学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报复行为，我后来分析，大概也和他的实际情况有关。这个同学在大一、大二期间，已经挂了不少科。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他能不能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对他来说，未来很可能只能拿到肄业证。在这种情况下，再多一门补考，对他的影响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一个人已经面对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那么新增的一点损失，有时候就很难再刺激他的情绪。所以我猜测，他当时可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当然，这只是我多年以后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当时的他到底怎么想，我并不知道。

还有一个作弊事件，是我在辅修计算机专业时，听汇编语言老师讲到的。这个事情发

生在我们前几届学生中。当时，这位老师带的一个班里，有一名学生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课，平时不上课，考试自然也就无法通过。期末考试，他的成绩肯定会不及格。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找人替考。而替他考试的，是一名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据老师说，两人可能是老乡，因为替考的人确实会做题，所以这场考试顺利通过了。班上有人匿名向老师举报，说这名学生找人替考，老师当然要找他了解情况。他没有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不仅如此，他还把替他考试的那名华师学生也说了出来。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这名学生被学校开除。而那名华师学生，因为参与替考，也被通报给华南师范大学，最后同样被开除。一个作弊事件，最后导致两个人都失去了大学生身份。后来，我和同班的广州籍同学讨论过这件事情。当时我的观点是：这个学生处理得太差了。我认为，匿名举报的人，既然选择匿名，说明他大概率不愿意公开站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承认，学校最多就是怀疑他作弊。即使安排重新考试，他如果考不过，学校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但至少，他没有必要把替他考试的华师学生供出来，毕竟，那个人是冒着风险帮他的。他们之间应该关系不错，否则也不会帮他做这种事情。结果现在好了：原本的铁杆朋友，最后变成了可能一辈子的仇人。我同学说：“老师有的是办法让你承认。”我的回答是：就算最后迫于压力承认，也不应该把帮自己的人牵扯进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回事，把别人一起拖下水，是另一回事。

当然，这件事情和前面那个原籍湖南学生被举报的事情，又有一些不同。前面的举报，是不同专业之间发生的事情，机制班和模具班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集。而这一次，是同班同学举报自己的同学。所以我猜测，举报人与这名作弊学生之间，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些矛盾，否则，一个同班同学，一般不会轻易把这种事情捅出去。当然，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多年以后回头看，这件事情让我感触比较深的，不只是作弊本身，而是人在面对错误时的选择。有些人犯错后，会想办法承担自己的后果，有些人则会为了保护自己，把身边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起推下去。而不同的选择，最后带来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写了这么多别人的作弊事件，最后也应该说说我自己。毕竟，学生时代完全没有作弊经历的人，恐怕并不多。我不敢说所有学生都有过作弊行为，但如果说 90%以上的学生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觉得并不夸张。当然，作弊也分很多种，有的是为了自己通过考试，有的是帮助别人。拿我自己来说，我真正为了自己作弊的次数并不多，更多时候反而是帮别人。记得有一次考大学化学，当时一位阳江籍的同学考试没有把握，就让我帮他。考试过程中，我就稍微侧了一下身体，让他能够看到我的答案。这当然属于违反考试纪律，但在当时的大学环境里，同学之间并不存在高中时期那种强烈的竞争关系。很多学生之间会形成一种想法：能帮别人一把，就帮别人一把。在学生时代，这甚至会被看成一种同学情谊。

当然，我也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作弊。那次考试是《金属热处理》。老师提前告诉我们，考试中会有 5 道名词解释题。每题 5 分，也就是说，这部分一共 25 分。对于考试来说，这 25 分非常关键，如果这 25 分全部拿到，及格基本就稳了。如果这部分丢掉，想通过考试就比较困难。老师虽然提前划了名词解释的范围，但是范围非常大，全部背下来，需要花费不少时间。而当时我还有计算机辅修的压力，辅修课程本身就占用了大量时间，让我放弃计算机辅修，把所有精力投入本专业考试复习，我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我用了一个当时大家都会用的办法。大学考试允许携带计算器，当时的计算器外壳是蓝黑色的。我用铅笔，把那些没有来得及背下来的名词解释，抄在了计算器外壳上。正常拿着计算器考试时，是看不到上面的字的，那次考试，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做。所以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强的负罪感。

多年以后参加工作，我比较重视规则。无论是设计流程、生产流程，还是和别人合

作，我都会尽量按照规定来。结果有一次，主管甚至开玩笑地讽刺我：“你怎么这么老实啊？我看你学生时代连作弊都不会！”事实刚好相反，我学生时代并不是没有作弊过。其实，职场里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人会把学生时代的小聪明、擦边球，甚至明显违反规则的行为，重新包装成：“会变通。”“有办法。”“灵活。”而那些一直比较遵守规则的人，反而容易被评价为：“太老实。”“不会来事。”“不够灵活。”但学生时代的游戏规则，和成年后的社会规则，并不是一回事。考试作弊可能只是一次小动作，但工作中的违规，影响的可能是一整个项目，甚至是一群人的利益。所以，一个人在学生时代有没有作弊，并不能简单判断他成年以后是什么样的人。

书呆子

大学生里面，书呆子的比例其实并不少。一般来说，到了大三以后，学生身上的那股书呆子气会慢慢退掉一些。毕竟在大学里待了两三年，多少接触了一些社会，也开始知道书本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但也有人，这股书呆子气一辈子都退不掉。前面说过的老太婆老师，我认为她就是这种类型。我说她“为人刻板”，其实多少就带着一点书呆子的味道。不过，我大三时在辅修计算机的过程中，还碰到过几个真正让我觉得有点“傻呼呼”的学生。他们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我跟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交集，但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学生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辅修的计算机专业大三时，有一门课叫《计算机网络》。也不知道是不是学校为了创收，当时学校允许其他高校的学生交钱过来选修。只要把课程学完并通过考试，也可以计入他们自己的学分。所以，课堂上除了我们这些本校辅修计算机的学生，还来了几个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看他们的样子，大概率都是大一学生。《计算机网络》这门课有一个问题。如果采用传统的闭卷考试，学生很容易把它学成纯粹的背概念，什么是网络协议、什么是某某模型、某个协议有什么特点……考前背一遍，考试写出来，考完就忘。老师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到了考试的时候，他决定采用开卷考试，目的很简单：既然这门课涉及大量概念，那就不要逼着学生死记硬背，考试的时候允许查书，让大家把重点放在理解和运用上。我觉得这个安排挺合理。结果，几个华工和华师的学生不干了，他们跑去找老师，说：“老师，不能开卷，应该闭卷考试。”理由也很有意思：只有闭卷考试，才能考出真正的水平。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差点没把我气笑。我心里想：你们到底是来学计算机网络的，还是来参加背书比赛的？老师当然没有理会他们。但我当时甚至有点替老师觉得可惜，因为如果我是老师，我当场就会答应：“好。你们几个要求闭卷，那你们几个闭卷，其他人继续开卷。“我倒想看看，他们几个到底能考出什么“真水平”。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有意思，这几个学生并不是不认真学习，他们可能属于那种非常认真、非常相信考试制度的人。在他们的思维里：闭卷 = 难度高 = 能区分水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正有意义的考试，不应该是看你能不能把书上的东西背下来，而应该看你能不能利用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如果允许查书，反而可能更接近实际工作。因为真正工作或做科学研究的时候，谁规定你不能查资料？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当年有记者问爱恩斯坦声音的速度（也有一说是光速）是多少。对方拒绝回答并让记者自己查资料。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当时对这几个学生感到好笑的地方，他们不是坏，也不是笨，只是还没有走出“学生思维”。 那几个华工、华师学生给我的感觉就是：书本里的东西学得很认真，但还没有学会跳出书本看问题。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书呆子气”。

更气人的事情还在后面。当时我辅修计算机，还有一门《微机原理》。这门课有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基础：要学过汇编语言。我们这些辅修计算机的学生，大二已经学完了《汇编语言》，所以到了大三学《微机原理》，基本的知识是接得上的。结果，那几个华南理工大

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大一就跑过来选修《微机原理》。问题是：他们连汇编语言都没学过。这下好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什么，他们基本都听不懂。老师也是好心，发现他们没有基础以后，干脆在课堂上重新给他们讲汇编语言。于是出现了一个很荒唐的结果：一门《微机原理》，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变成了我们陪着他们重新学《汇编语言》。我们本来已经学过的东西，又得重新听一遍。我们的学习进度也因此被拖慢。当时我心里真是又气又无奈：你连先修课程都没学过，跑来选这门课干什么？

多年以后，我在大陆学生去香港读大学的一些新闻和讨论中，又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些大陆学生不会听粤语，到了香港上大学以后，要求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于是，有些老师只能一句粤语，再夹一句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来讲。这样一来，香港本地学生的学习进度自然也可能受到影响。我看到这种情况时，马上就想起了当年《微机原理》的事情。所以，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真心替那些香港学生鸣不平。难道你们去英美留学也要对方讲普通话？！入乡随俗不清楚吗？说回我的《微机原理》这门课程的事。第一个问题，是学生自己对课程体系不了解，可能只是听到“微机原理”这个名字，觉得很高级、很热门，就跑过去报名，却不知道《微机原理》和《汇编语言》之间是有先后关系的，你连前面的基础课都没有学过，直接跳到后面的课程，当然听得一头雾水。第二个问题，是**学**校的选修制度也存在问题。既然学校允许外校学生交钱选修，就应该至少审核一下学生有没有必要的基础，如果一门课程明确要求先修另一门课程，却不管学生有没有学过，谁报名都收，那么最后出现这种结果也就不奇怪了。学校是收到了钱，学生也选到了自己想学的课程，但最后却变成：老师负责补基础，原本已经学过的学生陪着重新听一遍，整个班的教学进度一起被拖慢。这其实就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现在回头看，我当年真正生气的，其实也不完全是那几个学生，他们大一就想学《微机原理》，未必有什么恶意。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这门课听起来很厉害，我就想学。问题在于，不知道自己缺什么基础，却又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学。学生有学生的问题，学校也有学校的问题，如果当时选修制度能够明确写清楚：《微机原理》必须先修《汇编语言》。然后报名时直接把没有修过汇编语言的人挡在门外，根本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些事情。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对这几个学生的评价也没有当年那么重了。他们有点书呆子气是真的，但更大的问题，是学校把一个本来应该由制度解决的问题，直接扔给了老师和整个班的学生。当年的我只是觉得：妈的，为什么又要让我们陪他们重学一遍汇编语言？

捣蛋篇

小学和中学时期，班干部通常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成绩好、纪律好、听老师话，往往就是班干部的标准。但是到了大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学里的班干部，不一定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学生”。 甚至有时候，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反而就是班干部带头干的。

1997 年 10 月份，我们机制一班和机制二班一起去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参观实习。实习期间，拖拉机厂给我们安排了住宿。当时宿舍有一个规定：不能在公共厕所里面洗澡。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南北方生活习惯的差异，洛阳属于北方。和南方很多家庭不同，当时北方不少居民家里并没有独立的洗澡设施。工厂宿舍也是一样的。洗澡通常要去公共澡堂，据说这和当地的建筑结构以及排水条件有关。所以，对于当地人来说，去公共澡堂洗澡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机制一班有几个学生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在宿舍公共厕所洗澡。我到现在都不太理解他们当时的想法，那可是 10 月份的洛阳，天气已经比较冷了。而公共厕所里又没有热水，只能用冷水冲洗。结果自然引起了宿舍管理员的不满，宿管老头出来制止，双方还发生过几次冲突。后来实习结束，准备离开拖拉机厂回学校，

也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机制一班有人在宿舍里搞起了恶作剧：把洗衣粉撒到床上，然后又泼水。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消息肯定传到了学校。据我了解，这件事还是机制一班班长带头做的。学校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班长在宿舍当着宿舍同学的面，说了一句："我不承认，让他们罚整个宿舍吧。反正罪不责众。"当时我就在现场。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符合某些学生时代的"歪理"， 意思就是：既然不知道是谁干的，那大家一起承担，学校也不能把所有人怎么样。结果，他话刚说完，他们班一位英德籍同学马上接了一句："班长，你别这样，我还有一个大过没消呢。"这个同学，就是前面写过的那次作弊事件里，被处分的其中一人，他显然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再受到牵连。最后，这位广州籍班长还是承认了事情是自己做的，学校的处理结果是：取消他所有的荣誉称号，并撤销班长职务。这个处分其实也不算特别严重，毕竟没有涉及安全事故，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其实回头看，这件事情挺符合大学时代的一些特点，很多人在中小学阶段，因为老师和家长的约束比较多，表现得比较规矩。到了大学以后，管理相对宽松，人的另一面就容易表现出来。有些人在学习上可能很认真，但在生活中，又会表现出年轻人的冲动和调皮。相比之下，我们机制二班就要规矩很多，不是说二班的同学都比一班优秀，而是整体氛围不同。像这种集体搞恶作剧、闹出事情的情况，基本和我们二班没有什么关系。

强者真的都不抱怨环境?

说到洛阳实习，再讲一个小插曲。前面提过，带我们去洛阳拖拉机厂实习的两位老师都是河南人，就是前面说的赵老师和李老师。到了洛阳以后，他们和厂里的领导交流时，直接用河南话沟通，很快就拉近了距离。也正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帮我们争取到了一份非常难得的东西：洛阳拖拉机厂自己编写的实习教材。份教材并不是公开出售的，而是厂里针对工人和技术人员上岗前培训准备的内部资料，里面有详细的曲轴和发动机缸体生产的全部工艺过程。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进入大型工厂参观学习的学生来说，这份教材帮助很大。时除了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有山东矿山机械学院的学生也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有一天，他们的带队老师看到我们的教材，觉得很奇怪，就过来问我们："你们这个教材在哪里买的？"我们回答："不是买的，是我们老师发给我们的。"对方听完以后也没有多说什么。但直到整个实习结束，我也没有看到山东矿山机械学院的学生拿到类似的教材。

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样是学生，同样来到一个工厂实习，学生本身的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但是，带队老师的能力、资源和做事方式，会直接影响学生能够获得什么。我们的老师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沟通能力，为学生争取到更多学习资料。所以，后来再听到"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这句话时，我总觉得这句话说得太绝对，很多时候，环境本身就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能力、有责任心的老师，可以帮助学生争取更好的学习条件。山东矿山机械学院的老师，可能只是完成自己的带队任务，最后受到影响的，都是学生。他们遇到的老师不同，得到的资源不同，大学四年里，能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有时候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经历。

留级与过英语四级的选择

在大学四年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就是英语四级考试。我们学校当时规定，所有本科学生都必须参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通过考试以后，会获得四级证书。而且，四级考试成绩还会按照一定规则计入英语课程成绩。当时的计算方式是：四级成绩加 10 分，作为我们的英语成绩。也就是说，四级考试至少要达到 50 分，英语这门课才算及格。这个规定放在今天看，可能很多人觉得只是一次英语考试。但在当时，对我们来说，

意义完全不一样。我先展开说一下当时我们专业的一些设定。我们专业实行的是学分制，学校规定，如果某个学期补考科目的学分超过当学期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就必须留级。所谓的留级，就是延期毕业。对于机制专业的学生来说，有三门课程尤其难。分别是：理论力学，机械原理和材料力学。其中，理论力学和机械原理安排在大二上学期，材料力学安排在大二下学期。这三门课程的学分都很高：理论力学和机械原理各 5.5 学分，材料力学 4.5 学分。而其它大部分课程，一般只有 1.5 到 2 学分。当时每个学期所有课程加起来，总学分大约在 10 到 15 分之间。也就是说，这三门课任何一门挂科，基本都会直接触发留级。

很多人可能觉得，留级无非就是晚一年毕业。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只是时间，而且还有经济压力。我那一届，是最后一届没有实行高收费的学生。整个大学期间，每年的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加起来大约 1360 元，而且四年没有变化。但是低我们一级的 1995 级学生，光是学费已经涨到了 3000 元。留级就要按 1995 级的标准来收费。我父母当时一个月工资加起来还不到 2000 元，而且我母亲所在单位效益不好，还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不到 50 岁，是没有退休金的。所以，对我来说，留级并不是简单的迟一年拿毕业证，那是一笔家庭根本不能轻松承担的额外开支。我自己的情况也很现实：我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在“留级”和“努力通过英语四级”之间，我只能先行选择不要留级。我把大量时间花在那三科主要学科上了。

那三门机制专业课程，我的材料力学考了 70 多分，理论力学好象是 78 分，但机械原理就只考了 61 分。假如当时我把精力偏向英语，大概率机械原理会补考，理论力学补考的可能性也不低，所以我到现在也认为当年的选择是对的。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英语四级考试，我的成绩都是 40 多分。距离 50 分，只差一点。但就是这一点，让人非常焦虑。后来洛阳实习结束，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那段时间，我没有出去玩，而是每天刷英语四级阅读题，一点一点补自己的短板。终于，大学阶段最后一次四级考试，我通过了，成绩是 50.5 分。如果这次再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成绩公布以后，我甚至不敢第一时间去看。同宿舍一位阳江籍同学去看了，顺便帮我查了一下成绩。他回来告诉我：“你 50.5 分。”因为他平时经常跟我开玩笑，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他再三确认，说绝对不会拿这个事情开玩笑。我这才急急忙忙跑到教学楼查看成绩，当我亲眼看到那个数字：50.5 分。那一刻，压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大学生活篇

打架篇

未进入大学之前，我对大学生的人设是懂知识，有理想，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一群菁英分子。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直觉上对大学生人设的认知。但是，毕竟大学生也是人，所以也有社会上人的一切特征。只不过，总体上来说，大学生与普通人相比，还是要理性一些。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讲道理一些。

我大一的时候，学校的宿舍和教室还不够用，所以学校临时租用（具体是租用还是借用，已不重要了）了附近一家叫“农垦干校”的校园，安排部分大一新生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这样一来，广东机械学院的学生和农垦干校的学生，就在同一个校园里活动。当然，双方的宿舍并不在一起。有一次，我在饭堂吃饭。突然之间，饭堂附近发生了冲突，六个男学生追着打两个男学生。当时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整个人都大惊失色，我和旁边的其他学生赶紧往旁边躲，生怕被卷进去。那两个被追打的学生，很快就认怂离开了。过了

两天，我在去饭堂的路上，又看到了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之前那六个男学生，全部穿着一样的牛仔衣裤。而且每个人的衣服里面，似乎都藏着一根短棍。突然，其中一个人看到旁边经过的一名学生，二话不说，直接挥棍打过去，被打的学生反应很快，一个闪身躲开，然后马上飞快跑掉。那几个人并没有追，只是站在那里骂骂咧咧地说："见一次打一次。"这一次，我倒没有第一次那么害怕了，因为我看出来，他们是在找特定的人报复。而我并不是他们报复的目标。又过了几天，学校公布了一份处分通报。看完通报内容，我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之前饭堂冲突的双方分别是广东机械学院的两名学生和农垦干校的六名学生。两名广机学生在饭堂与对方发生冲突后，被六个人围打。这两名学生不服气，回宿舍叫了几个人，拿着棍棒跑到对方宿舍想报复。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农垦干校那边的人更加团结，整个宿舍的人拿着体育器材一起冲出来，反而把他们打跑了。之后，就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一幕：农垦干校的学生统一穿着牛仔衣裤，带着棍子，在校园里寻找那些参与冲突的人。

这件事情给当时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因为在高中时期，我们想象中的大学，应该是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文明的地方。大家都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会更加理性。可是现实却告诉我们：大学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缩影。进入大学，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自动变得成熟，有些人的年龄增长了，学历提高了，但处理事情的方式，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层面。当时我们很多同学心里都有一个疑问："怎么这样的人也能读大学？"

大学生打群架这种事情，肯定发生过不少。在我的大学四年里，我亲眼见到的就有两起。前面说过的那次，是广东机械学院学生与农垦干校学生之间的冲突，另一场，则发生在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之间。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当时的地理环境。我们学校附近可以说是大学扎堆，广东机械学院旁边就是华南理工大学，而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门附近就是华南农业大学。再远一些，还有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中山大学。所以，我们这一带大学生非常多，不同学校的学生在校外碰到，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那是大二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到校外的大排档吃夜宵。大概晚上八点多，同一个大排档里，两名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和六名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六个人仗着人多，追着那两个人打。那两个人一看打不过，转身就跑，六个人也没有继续追，而是回到大排档，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聊天、吃东西。我们几个当时也没太当回事，毕竟打架这种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十几个学生突然拿着棍棒冲了过来，目标就是刚才那六个人。这一下，局面彻底失控，刚才还坐在那里吃东西的六个人，马上抄起椅子进行反抗，桌面上的杯子、碗之类的东西，也被他们抓起来往对方身上砸。整个大排档顿时乱成一团。突然，有一个人朝我们这张桌子冲了过来，我们四个人当场大惊失色。我心里第一反应就是："大哥，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啊！"但是转念一想，就算真是冲我们来的，现在这种场面，跟他说这句话又有什么用？于是我们四个人非常默契地同时站起来——跑！跑出去以后，我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误会了，那个人根本不是冲我们来的，他只是冲过来拿桌面上的酒壶、杯子和碗，继续砸人。不过我们也不敢再留下来，四个人一路跑到附近的游戏机厅，躲进去以后才敢伸出脑袋往外看。最后的结果是，大排档里的其他客人早就跑光了，大排档老板一个晚上基本不用做生意了。不仅损失了整个晚上的营业收入，店里的杯子、碗之类的东西也被砸坏了不少。因为场面实在太乱，最后连夜宵钱都没来得及付，成功逃单。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校外，而且双方又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后来我也没有看到学校发布什么处分通告。

据我所知，在我大学时代前后，那几年另外还发生过一次规模更大的打斗。这次不是我亲眼见到的，而是其中一名当事人亲口告诉我的。这个人后来成了我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个公司同事。他当时是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的专科生。事情发生在华南理工大学后面的

商业街，那时候，他们十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一起到商业街的舞厅喝酒、跳舞。其中一个人喝醉了，于是，我这个同事和另外一个同学扶着他回宿舍。路过一家大排档的时候，大排档里面有人说了一句：“不能喝就别喝嘛。”。这句话也未必是在说他们。但当时他们可能认为这句话是在嘲讽自己的同伴，于是，三个人直接冲进大排档打人。问题是，大排档里对方当然不可能只有三个人，里面的人马上跟他们打了起来。而那十几个还留在舞厅里的同学听到动静以后，也一起冲了出来，加入了这场混战。最后，直接把大排档砸得一片狼藉。

当时商业街上还有很多骑摩托车载客的，那个年代，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谋生方式。直到 2010 年以后，这种摩托车载客才逐渐减少。打架过程中，有人把旁边一辆载客摩托车推倒了。摩托车的主人见自己的车被弄倒，当然跑过来理论。结果不但没得到赔偿，反而被他们一起推倒，又挨了一顿打，据我同事说，这个人后来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打完以后，这群华工学生自己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他们干脆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暂时躲着风头。但后来这件事情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至少我同事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如果他当年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开除或者处理到拿不到毕业证，那么后来自然也不会毕业，更不会成为我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个同事。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件事情也算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因果关系。当时他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一场酒后打架，最后居然会成为几十年后一个普通同事回忆录里的故事。

吃饭篇

人是要吃饭的。大学生也是人，当然也得吃饭。大学生活里除了上课、考试、实习、打架、作弊，还有一个每天都绕不开的问题：吃饭。我就说说我记忆中的大学饭堂。那个年代，吃饭和现在完全是两回事，没有微信支付，没有支付宝，甚至连银行卡刷卡都没有，大学生吃饭靠的是饭票。我大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农垦干校度过的，所以平时吃饭也就在农垦干校的饭堂解决。那个年代，各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专属饭票。而且不同学校的饭票，通常只能在自己的饭堂使用。华南理工大学的饭票，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它有 1 元、5 角、2 角、1 角四种面值，采用塑料片制作。塑料片上做了真空镀铝层，外面还覆盖了一层透明保护膜。一张饭票而已，居然做得像个小型防伪产品。其中 1 元和 5 角的比较常见，1 角和 2 角的相对少见。广东机械学院和农垦干校的饭票，同样是塑料片制作。农垦干校有 1 元、2 角和 1 角三种面值。广东机械学院则有 5 角、2 角和 1 角三种面值。不过三种饭票的塑料材质还是有些区别。农垦干校的饭票明显比广东机械学院的软一些，我现在回想，应该比较接近 LLDPE 一类的塑料。至于制作工艺，两者都没有华南理工大学那么精细。各个学校的饭堂一般只收本校饭票，不收现金。所以你去饭堂吃饭，不能掏出一块钱人民币说：“师傅，来份饭。”你得使用饭票。饭堂旁边的小卖部也通常接受本校饭票，可以拿饭票买一些东西。在没有移动支付、没有二维码、甚至没有银行卡支付的年代，这种方式虽然原始，但确实很方便。至少身上不用天天准备一大堆零钱。华南理工大学的饭票则更“牛逼”一点，它不只可以在学校饭堂使用，连学校附近商业街的小卖部和大排档都能拿来结账。所以华工饭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校园货币”的味道。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个问题：这么好用的东西，自然有人想造假的。

我大一的时候，在农垦干校还亲身遇到过一次假饭票。有一天，茂名籍的同学给了我几张饭票，让我帮他打饭。我拿着饭票去饭堂。打饭的时候，饭堂工作人员突然拿起其中一张面值一元的饭票，看了一眼，然后用广州话说了一句：“流嘢。”意思就是：假货。然后直接把那张饭票没收了。我把饭打完以后，回去跟同学说了这事，让他还我一元。这件事情后来让我印象挺深，饭堂处理假饭票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见到一张，没收一张。至

于到底怎么辨别真假，我从头到尾也没搞明白。这件事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平息下来，后来似乎也没有再出现什么假饭票。但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饭堂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假饭票造成的损失，实际上被转嫁给了拿到假票的学生。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拿到的是假票。拿去吃饭，被没收，饭没吃到，钱也没了。而饭堂只需要一句“假票”，事情就结束了。华南理工大学的饭票制作工艺比较精细，听说很少有人能够仿造。广东机械学院的饭票，我倒是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严重的假票问题。至于农垦干校那次，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张一元饭票究竟是怎么被认出来的。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学生吃饭的一点小细节。现在的人吃饭，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行。我们那个年代呢？先掏饭票。而且还得看清楚是哪家学校的。不同学校的饭票，就像不同银行发行的钞票一样，不是拿到一张塑料片就能到处花的。

说完饭票，再说说当年各个大学饭堂饭菜的区别。我上大学的时候，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机械学院、农垦干校这三家的饭堂我都吃过。总体来说，普通一顿饭的价格大概在 3.3 元到 5 元之间。当然，如果不吃肉，只吃素菜和主食，2.5 元左右也能解决一顿。那个年代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并不高，所以大部分学生吃饭还是比较节省的。不是每顿都要有肉，有时候一个荤菜搭配几个素菜，已经算不错了。除了这三家，我还去过华南农业大学吃过一次饭。当时是跟同学一起去华农玩，顺便在他们学校饭堂解决午饭。这一吃，马上感觉出了区别。华农的饭菜明显比我们学校便宜。我们这边 3.5 元左右的一顿饭，在华农大概 2.5 元就能买到，而且分量还更足。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同样的钱，在华农吃得更饱。后来听同学说，华南师范大学的饭堂可能是附近高校里面最便宜的。原因是他们学校有国家补贴。不过华师离我们学校相对远一些，我一直没有机会过去吃，所以这个只是听说，没有亲自验证。现在回头看，当年的大学饭堂其实也反映出了不同学校的一些特点。有些学校经费条件好，饭堂投入大；有些学校有政策补贴，学生吃饭成本低；有些学校则只能按照正常成本运营。这就是 90 年代大学生活最普通、也最真实的一部分。

大二的时候，我们终于从农垦干校搬回了学校本部。这时候，学校已经完成合并，广东机械学院与广东工学院、华南建筑学院东院合并，正式改名为广东工业大学。不过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说，感情上还是更认同自己是广东机械学院的学生。所以后面我还是习惯把学校简称为“广机”。 搬回校本部以后，农垦干校的宿舍就留给下一届广机学生使用了。回到本部生活后，吃饭的问题也出现了。如果比较我吃过的几个学校饭堂，广机的饭菜算是其中最差的。而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是华南理工大学。华工的饭堂距离我们宿舍大概也就一公里左右。于是，很多学生很自然地选择了一个办法：买华工的饭票，带上自己的饭盒和餐具，跑到华工吃饭。那个年代的大学饭堂不像现在，不会提供餐具。学生吃饭必须自己准备饭盒、饭勺、筷子。吃完以后还要自己洗干净，下一顿继续用。所以去哪个学校吃饭，其实并没有现在想象中那么复杂。一张饭票，一个饭盒，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广机自己的饭票我们也不会完全不用。毕竟华工虽然近，但也不是每天都方便过去。遇到刮风下雨，或者当天课程比较紧，就懒得跑这一公里了。这时候就在自己学校饭堂解决。所以当时大学生的生活其实很简单：哪里饭菜便宜、好吃，就去哪里吃；天气不好、时间紧，就在自己学校吃。没有手机支付，没有外卖，也没有各种选择。饭票加饭盒，就是 90 年代大学生活里每天都会重复的小事情。

在广机本部生活、学习了半年以后，学校饭堂开始尝试改革，推出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刷卡吃饭。饭堂发行一种磁卡，学生先往卡里充钱，吃饭的时候直接刷卡消费，办这张卡需要交 20 元，其中 10 元是押金，另外 10 元是工本费。充值也不是现在这种网上操作，而是拿着现金到饭堂专门的充值窗口办理。每天都有专人在那里负责。不过，改革归改革，饭票并没有取消。按照我的思维方式，这张磁卡首先就要让我亏 10 元工本费。至于那 10 元押金，以后毕业的时候到底能不能顺利退回来，我当时也不知道。如果押金

最后也退不了，那就是整整亏 20 元。而现在饭票还能继续用，饭票甚至还能在学校小卖部当钱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花 20 元去办一张可办可不办的磁卡？于是我果断决定：不办。我把这个想法拿回宿舍跟同学一说，所有珠三角地区的同学都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连前面那个带头搞恶作剧、最后被撤掉班长职务的捣蛋班长，也表示赞同。不过，我宿舍那个阳江籍的同学偏偏要跟我抬杠。他说：“你买衣服穿也亏钱啊，那还买？”我当时被他这么一问，还真不知道怎么反驳。其实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完全可以这么回答：“我买衣服是因为我需要穿，没得选。这个磁卡可办可不办，我当然选不办。”我这个人这方面反应比较慢，没杠的过他。那一次，我算是被他占了上风。后来我扳回一局，等下说。现在回头看，这件小事其实挺有意思。那时候大家第一次接触“刷卡消费”，学校在尝试新的管理方式，而我考虑的却很简单：旧的饭票还能用，新饭卡又要花 20 块钱，那我为什么要换？

不过，广机的饭卡改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磁卡刚投入使用的时候，各种问题不断出现，有时候刷不了卡，有时候扣不了钱，还有时候明明只消费一次，却出现扣错金额的情况。这些问题反复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来系统才慢慢稳定下来。本以为饭卡系统正常运行以后，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新的问题又来了。而且这一次不是系统问题，而是直接出了事故。

一天晚上，学校饭堂被盗。那台负责饭卡充值和数据管理的电脑被人拆走了硬盘和内存。要知道，那可是 90 年代，当时的电脑硬件不像现在这么便宜。机械硬盘非常贵，一个硬盘动辄 1000 多元，内存更夸张，那时候计算机内存还是按“M”计算，不是现在的“G”。 一根 1M 的内存条，大概要 300 元左右，所以小偷拆走的虽然只是几个电脑部件，但价值并不低。饭堂被盗以后，第二天上午整个学校都炸锅了。很多学生看到饭卡系统出了问题，只能放弃刷卡，改用饭票。但问题是，有些学生已经完全依赖饭卡了，手里根本没有饭票。结果就是：我们这些坚持用饭票的人，照常排队打饭；那些只带饭卡的人，只能临时跑去买饭票，然后重新排队。当时看着这个场景，我心里其实有一点庆幸。

学校后来恢复了数据。不过，备份数据不是当天的，而是一星期以前的。于是问题又来了，有些学生明明已经把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但数据恢复以后，卡里又多出了几十元。还有些学生明明刚刚充值了，却因为数据恢复不到，显示卡里没有钱。好在这一次学校没有像之前假饭票事件那样简单粗暴处理，学校没有要求学生自己证明卡里原来有多少钱，而是采取了比较负责的方式：让学生自己申报卡里的余额，然后无条件帮学生补回来，这件事总算没有造成更大的矛盾。事情发展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回头笑我的那个阳江籍同学了。当初他说我不办饭卡是不懂享受，现在我就问他：“磁卡用得爽不爽？”当然，这只是同学之间的玩笑。不过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很多学生对饭卡失去了信心，不少人把卡里的余额用完以后，就不再充值，重新买回饭票。慢慢地，饭卡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大概半年以后，广机的饭卡制度就取消了。直到我毕业的时候，广机饭堂依然还是使用饭票。那场 90 年代的校园信息化改革，就这样短暂地出现，又悄悄结束了。

广机这边后来还是继续使用饭票，但旁边的华南理工大学却开始搞饭卡了。而且华工在搞饭卡的同时取消了饭票。华工的饭卡跟广机的不一样，广机之前搞的是磁卡，华工用的却是一种光学原理的卡片。卡片上有很多小孔，每张卡的小孔数量和位置都不一样。吃饭的时候，把卡插进机器里读取。我当时虽然还没学过什么专业的计算机硬件知识，但因为自己对计算机比较感兴趣，一看这个东西就大概猜到了：这应该就是用小孔的位置和数量表示二进制编码，再用光学元件读取。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玩意儿还挺新鲜。更重要的是，华工这次办饭卡的条件，比广机厚道，不收工本费，只收 10 元押金。比广机那张卡少收了 10 元。前面广机推出饭卡的时候，我死活不办，认为花 20 元办一张可有可无的卡不划算，这次华工的饭卡，我却毫不犹豫地办了。原因也很简单：华工的饭菜比广机好

吃。华工取消了饭票，不办卡我就不能吃华工饭堂的饭。而且我当时大部分时间本来就在华工吃饭，既然天天都要用，10 元押金又不算多，那这笔钱就值得花。现在回头看，其实两次选择并不矛盾，广机是饭卡与饭票同时用，饭卡可办可不办，办了还要多花钱。华工的饭卡则是：饭菜还更好吃，我本来就天天跑你这里吃饭，而且华工取消了饭票，不办就吃不了华工的饭。同样是饭卡，我算出来的账不一样，最后的选择当然也不一样。至于那张华工饭卡，毕业以后我嫌麻烦，押金也懒得去退，直接把卡扔了。

娱乐篇

90 年代的大学生活其实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游戏，也没有各种短视频。平时除了上课、看书，真正属于自己的娱乐并不多。对我来说，大学时期最大的娱乐，就是周末去看电影。不过，说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其实并不准确，当时很多地方并不是正规的电影院，而是一个个的放映厅。里面使用的是大型盗版镭射光盘，通过投影设备播放。虽然条件跟现在的影院完全不能比，但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享受了。那个年代，国外大片进入国内的速度其实非常快，基本上一部好莱坞电影上映以后，不到三个月，我们就能看到。从 1994 年的《真实谎言》，到 1998 年的《泰坦尼克号》，大学四年时间，我几乎完整经历了 90 年代好莱坞大片最辉煌的一段时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喜欢上了好莱坞电影。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几部电影，有：《真实谎言》、《夜访吸血鬼》、《燃情岁月》也是通过后两部电影，我认识了布拉德·皮特，当时的他，绝对是好莱坞公认的大帅哥。相比之下，当时国内电影无论从制作水平、故事结构，还是背景音乐、音效方面，都很难跟这些好莱坞商业大片相比。

我看的第一部美国大片，就是《真实谎言》。一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是一部动作片。阿诺饰演的角色潜入豪宅，偷偷调查情报，又是伪装，又是跳舞。我当时甚至觉得：这是不是一部偏文艺的间谍电影？结果下一秒，剧情直接反转。他走到门口，被守卫要求出示邀请函。他不慌不忙，拿出一个炸弹遥控器，按下按钮。远处的爆炸瞬间发生，接着几个暴击打倒守卫，几个动作干净利落。其间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我的邀请函。”那一刻我直接被吸引住了。这种又紧张、又幽默的动作风格的电影情节，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个情节最后的追逐戏更让我印象深刻。他的搭档一路兴奋地夸他，说他多么厉害，结果到了最后关头，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请往后一点。”然后当着搭档的面，连续两枪解决最后两个追兵。旁边的搭档直接看傻了。那种感觉就是：紧张的动作场面里面夹杂幽默；主角很强，但又不会一直摆出严肃的英雄姿态。这种风格深深吸引了我。从那以后，我对美国大片的喜欢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个年代，我们认识的很多好莱坞明星，也都是通过这些盗版电影进入视野的。很多中国观众认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就是从《泰坦尼克号》开始。而我认识布拉德·皮特，则是从《夜访吸血鬼》和《燃情岁月》开始。现在回头看，那几年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群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通过一个简陋的投影厅，第一次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

说个小插曲吧，美国电影《真实谎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不只是因为电影本身精彩，还因为它在无意中拉近了我和家人之间的一点代沟。1995 年前后，正是 VCD 开始流行的时代。除了 VCD 机，各种盗版 VCD 光碟也随之出现。《真实谎言》自然也在其中。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部电影，就花了 20 块钱买了一张。有一天，我在家里放这部电影。我妈本来是不太喜欢看外国电影的，但电影一开场，阿诺那一连串动作和场景就把她吸引住了。她干脆坐下来跟我一起看。电影里有些地方她看不懂，就不断问我，我也就一边看一边给她解释。她看到阿诺拿枪激战、街头追车、进出豪华酒店这些场面，多少有点想不

通。因为在她的认知里，拿枪的不是军人就是警察。偏偏电影里的阿诺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普通军人。于是她问我："主角系做咩嘢㗎？"我说："特工。"她显然没听明白。我又解释："就是你们以前说的特务。"我妈马上就脱口而出："甘呢个人米系衰人？"我一下就笑了。我爸在旁边赶紧解释："不对的，特务是敌我双方都有的职位。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部队就有特务连。"我妈这才慢慢明白过来。其实这也不能怪她，我妈是 20 世纪中叶出生的人，她年轻时接触到的电影、电视剧里，"特务"基本就是一种固定形象：国民党那边派出来的，阴险、狠毒、满脸凶相，干的也全是坏事。所以在她那一代人的潜意识里，"特务"几乎就等于"坏人"。 这种观念其实并不只是我妈一个人的。后来我看电视剧《亮剑》，里面李云龙的妻子给儿子取名叫"特特"，意思是"特别"。结果李云龙一听，张口就是："什么特特？还特务呢！"现在想想，这个笑话其实也很有意思。"特务"这个词在不同人的脑子里，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对我妈那一代人来说，特务首先意味着"坏人"；而对我这个已经开始接触美国电影的年轻人来说，特工则可以是像阿诺这样的主角——拿着枪满世界跑，既能打，又能开玩笑，还是正义的一方。一张 20 块钱的盗版 VCD，居然让我和我妈聊了这么多东西。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记得《真实谎言》的另一个原因。

到了大四，学校里有人开起了网吧，和现在街上的网吧有点类似。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接入互联网，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个局域网游戏厅，大家主要就是在里面联机玩游戏。当时最热门的游戏之一，就是《红色警戒 1》。大四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应付毕业设计，平时并不是特别忙。所以我隔一两天就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玩一次，放松一下。那时候有一个大一的学生，让我印象比较深。他几乎天天泡在网吧里。我当时还觉得奇怪：一个大一新生，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天天玩游戏？后来到了学期末才知道，原来他挂了好几门课。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大学生活刚开始，如果能把游戏和学习安排好，其实完全可以两者兼顾。但如果沉迷其中，最后影响了学业，确实有些得不偿失。

情感篇

最后，说说我大学时代的情感生活。这一部分本来我是没打算写的。毕竟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恋爱、情感这些事情多少带有一点私人性质。不过想了想，还是简单写一下。毕竟时代不同，大学生活的环境也完全不同。把当年的情况记录下来，也方便后来的人拿它与现在的大学生活做一个对比。那个年代，所有大学都有两条非常明确的校规：第一，大学期间不允许结婚。第二，大学生不得发生性行为。这两条规定，无论违反哪一条，处罚都是开除，基本没有商量余地。至于谈恋爱，学校并不是禁止的。只要不过分公开，不影响学习，一般不会有人管。结婚这种事情，在当年的大学校园里实在太过于高调。所以整个大学四年，我没有听说或者见过有人因为结婚被学校开除。但因为发生性行为被开除的事情，我倒是听说过。那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对学生，在校园内发生性行为，被保安当场发现。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开除。相比之下，大学生谈恋爱的情况倒是听说过不少。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原籍湖南的学生。有一天，一个其它系的女生来到我们宿舍找他。当时他刚好不在。那个女生也没有找宿舍其他同学转告，而是在他的书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的内容很简单："平，到 XX 地方找我。"只有短短几个字，没有署名，也没有其它信息。不过在那个年代，看到这张字条，我们基本就能判断出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当时广东本地学生之间的交流习惯很明显。到宿舍找人，如果没找到，一般都会直接跟宿舍同学说："麻烦叫一下某某。"或者让舍友帮忙转达。很少有人像这样，直接留一张只有两个人才看得懂的信息。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当时珠三角地区的人称呼朋友或认识的人，名字前面通常会加一个"阿"字。比如阿伟、阿强、阿全等等。但她写的是"平"。 少了一个"阿"字，但在那个年代的语境下，这种写法反而更像亲密关系之

间的称呼。所以当时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他们应该是在谈恋爱。不过，那个年代大学生谈恋爱，最后能走到一起的并不算多。一方面，大学期间不能结婚；另一方面，毕业以后大家又会面对工作、分配、地域等现实问题。而这位原籍湖南的学生，最后连毕业都没有顺利完成，自然也没有什么后续了。再简单聊一下这位原籍湖南的学生吧。我们学校位于广州五山区。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广东省。即使在家里说方言的，到了大二以后就渐渐全部用广州话交流。只有这位原籍湖南的学生，一直与我们用普通话交流，并没有真正融入我们这个群体。

结束语

我的大学阶段一共在广东机械学院学习和生活了三年，在学校租用的农垦干部学校学习和生活了一年。大学四年所经历的人和事，当然远远不止以上这些。那些年遇到的老师、同学，以及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实际上还有很多值得记录的东西。只是随着时间过去，有些事情已经逐渐淡忘，有些事情则因为太过平常，没有必要全部写下来。但以上这些经历，无论是让我感到愤怒的，感到遗憾的，还是让我感到温暖和感激的，都在我的大学时代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我觉得它们应该被记录下来。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评价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证明当年的自己对或者错，只是希望多年以后，有人看到这些文字时，能够了解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一所普通工科大学的学习环境、校园氛围，以及那个时代大学生真实的生活状态。那些已经消逝的校园、那些曾经一起学习生活的人，还有那些看似普通却难以忘记的事情，都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文字，也许就是保存这些记忆最好的方式。